

语言接触与撒拉语的变化

马 伟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 本文根据撒拉语与汉语之间的语言接触情况, 分析了撒拉语在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所发生的朝着汉语方向发展的趋势, 并指出来自于汉语方面的持续而强烈的影响是撒拉语濒危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语言接触; 汉语; 撒拉语; 变化

中图分类号: H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47(2009)03-0029-07

世界上的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总是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中。这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接触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 是语言间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关系”。^[1]语言接触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之间的接触。不同民族或社群之间的接触大致有三种情况: 邻界接触、移民迁入和远距离的经济、文化交流。前两种属于直接接触, 后一种属于间接接触。^[2]不管是哪一种接触, 都会引起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撒拉族先民及撒拉族与汉族之间自古以来就发生着上述三方面的密切关系, 这种民族之间的交往势必会引起这两个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因语言接触而引起的撒拉语变化的问题。

一、撒拉族及其先民与汉族的接触

撒拉族先民出自乌古斯突厥^[3], 而突厥是继匈奴之后, 在中国西北出现的一个影响最大的民族集团, 无论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 还是对亚洲大部分地区, 主要是对中亚、西亚历史的发展, 都有很大影响。^[4]自公元 6 世纪至 8 世纪中叶, 突厥人的活动长达 200 多年, 在其强盛时期, 曾占据了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和中亚草原的广袤地区。无论是在隋唐时期, 还是在宋元时期; 无论是在平时时期, 还是在战争时期, 突厥及其后来的突厥语系民族与中原内地之间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过。

突厥民族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第一个拥有自己文字的民族。^①早在公元 5 世纪, 突厥人就创造了文字。我国史书《周书·突厥传》中就记载突厥人已有文字, 但是什么样的文字, 其结构如何, 直到 19 世纪末以前, 人们并不知道。1696~1697 年俄国人塞苗·列梅佐夫在《西伯利亚图册》中提到在中亚也有此种文字的碑铭。后来, 关于此种文字的学术文章不断见诸报端,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但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1893 年, 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成功解读了这些碑文, 发表了《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这一成果震惊了整个欧洲学术界。因突厥文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过的如尼(Runic)文相似, 所以有人称它为古代突厥如尼文。目前留下来的突厥如尼文主要来自于 20 多块碑文, 其中最有名的是《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和《墩欲谷碑》。这些石碑是在公元 8 世纪刻制的, 都是用突厥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撰写的, 其中还有一块石碑的汉文是由唐玄宗亲自所书的。由此可见, 当时的突厥与中原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而紧密的。这种交流自然也就包含了双方语言的交流, 而且彼此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撒拉族自中亚迁居今天的循化后, 生活在汉藏文化的腹地, 和汉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在元朝时期, 撒拉族首领已是当时积石州的达鲁花赤, 管理包括撒拉族地区在内的今循化及周边地区。明洪武三年(1370), 撒拉族归附明朝, 并从这一时期开始使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濒危语言——撒拉语研究》(批准号: 04BYY03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09-03-10

作者简介: 马伟(1970—), 男, 撒拉族, 青海循化人,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民族语言文化。

用汉姓。撒拉族的韩姓和马姓两大姓即始于此。明朝政府实施土司制度对撒拉族地区进行统治。撒拉族土司的官职从开始的正六品百户升为从五品的副千户。由于从元代以来就“表现出来的勇敢剽悍的战斗作风和军事业绩”^[5],撒拉族在明代备受重用。在明代 270 多年中,撒拉族土司率领其士兵参与明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达 17 次之多。除了政治联系外,茶马互市等经济活动也将撒拉族与内地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撒拉族社会的发展,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在撒拉族地区设立了两个土千户。次年,又在撒拉族地方设营,为“循化营”。“循化”一名,也由雍正亲自所赐。乾隆二十七年(1762),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撒拉族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又在该地设立了县一级的地方政权机构即“循化厅”。除了和内地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外,撒拉族居住的周边地方自明代开始就有大批汉人进入。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各民族之间难分彼此,以至于在成书于乾隆时期的《循化志》卷四中说,汉人“历年既久,一切同土人(指当地少数民族)。”^[6]

除了汉族外,讲汉语的回族等民族和撒拉族的交往,也使得汉语对撒拉语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相同的宗教信仰,撒拉族和回族之间的通婚也非常频繁,因而有一定数量的回族融入到撒拉族人口当中。据循化石头坡村《陈氏家谱》记载^[7]:石头坡村陈姓始祖陈鸿政和其弟陈鸿发原居今江苏省南京市大柳树巷,清咸丰年间,陈氏应拔募兵,迁眷先到今陕西西安城小学习巷,不久陈鸿政、陈鸿发兄弟拔应“团勇”,驰援甘肃省地道县(今临洮县)兵变,后自由择居步行到达甘肃省循化县街子工,兄弟二人留居当地,陈鸿政定居草滩坝、沙坝塘一带,陈鸿发定居石头坡村,与本村撒拉族韩氏女结婚,其子孙繁衍 100 多年,已到第十辈,共有 200 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撒拉族人民受教育的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学习汉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撒拉族群众开始走出家乡,在全国各地生活,汉语也就成了他们主要的对外交际工具。所有这一切,都为汉语和撒拉语的接触提供了现实基础。从对撒拉族和汉语的对比中看出,汉语对撒拉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语音和语法等三个方面。

二、汉语对撒拉语词汇的影响

(一) 汉语对撒拉语的影响最主要的是表现在词汇方面

在撒拉语中保存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就目前而言,汉语借词是所有撒拉语借词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借词。这些借词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撒拉语中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为早期汉语借词和近期汉语借词。早期借词往往带有古代汉语的特点,而近期借词则具有现代汉语的特点。从时间上来说,早期借词大多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而近期借词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撒拉语中的。

撒拉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②

be ġ	伯克(官名)	sefin	裁缝
xap	袋子(甲)	dingjir	顶针
ča	茶	gijir	戒指
jing	真	dangpu	当铺
dingna	听	jang	刚
suila	催	bola	包
yamın	衙门	du ġ	蠹
dong	冻	cügu	竹篾
sey	菜	len' gi	槌枷
xansi	咸菜	gi sang	县城(街上)
lazi	辣子	zı	集
lim	擦	pi sde	写
jiutu	镢头	pi stix	文书
kon	宽	jingna	蒸
xa ġit	纸(< 穀纸)	banding	凳子
kanjir	坎肩儿	zenzi	剪子
ga ġ	曲	šatang	沙糖
sın ca	清茶	ding	等(平均)
sola	锁	zen	贱
yangzi	样子	yangtang	水果糖
xey	鞋	liangzi	兵(粮子)
gu	鼓	yangxu	火柴
šügun	手绢	damna	担
jonggi	庄稼	gila	记
tam	淡	zanzı	碗
pansen	盘缠	gulu	轮子
koden	搅团	minjang	图章
kan	件	sıfin	粉条
gang	间	sın	信
tala	拓	ziugang	缸,酒坛
zele	接	si	才

在上述借词中,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见不到 zh、ch、sh 三个声母,这说明当时撒拉语在吸收汉语借词时,汉语中的 zh、ch、sh 还没产生。汉语借词 jonggi(庄稼)、kan(件)、gang(间)、len' gi(槌枷)中加点的字按今天普通话的读法,其声母都为 j,那么,这些借词的声母在撒拉语中为什么是 g、k 呢? 我们认为,这是早期循化地区汉语的真实面貌在撒拉语中留下的“活化石”,即这是早期循化话(汉语)在撒拉语中的表现。汉族到青海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汉宣帝时代赵充国率万余士兵在湟水流

域屯田;另一次是明初及以后实行的较大规模的军屯、民屯。^[8]我们认为第二次移民跟循化有关系。青海民间普遍传说,西宁一带的汉人是由南京竹子巷(亦说珠玑巷)来的,循化一带的汉人也自称是明初从南京一带来的。^[9]其实这些都是大规模的移民,而这些汉族移民说的是江浙方言,在这种方言中把北京话中的j、q读成g、k,这也是循化地区至今把“街子”(循化县地名)读成geizi的原因。这种江浙方言保留在现代循化汉语中的还很多,如循化话鼻音韵尾en、eng不分,in、ing不分等,甚至有的n、l不分,如“农”、“弄”都为“l”声母,“鞋”、“孩”都为“h”声母等。^[10]可见,撒拉语中那些汉语借词是来自于当时的汉语方言的,它保留了汉语中古音的某些语音特点。汉语借词如be ġ“伯克(官名)”、ča“茶”、sîn ča“清茶”、ding“等(平均)”、jing“真”、xa ġit“纸(<穀纸)”等进入撒拉语的时间可能更早一点,因为在许多其他突厥语当中也有这些汉语借词。由此可见,汉语对撒拉语影响之久远。

到了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撒拉语和汉语之间的接触日益增多,汉语对撒拉语影响也不断加强,因而在撒拉语中又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例如:

ganbu	干部	zhǐzi	侄子
dangyüen	党员	sunzi	孙子
tuenyüen	团员	dienshi	电视
sheyüen	社员	luyinji	录音机
zhuǐ	主席	shoubio	手表
shuji	书记	shu	书
šen Zhang	县长	šuešo	学校
cüzhang	区长	loshi	老师
sun Zhang	村长	kabu	挎包
sang Zhang	乡长	boyli	玻璃
duizhang	队长	san	伞
tanzǐ	毯子	tuolaji	拖拉机
luzǐ	炉子	lienpin	脸盆
chang	床	dienxua	电话
yago	牙膏	yashua	牙刷
chǐzi	车子	ciyu	汽油
yinxang	银行	liši	利息
gunzi	工资	zhun	钟
gangbi	钢笔	čienbi	铅笔
bozhǐ	报纸	yiüen	医院
yiupio	邮票	guojia	国家
zhǐnfu	政府	šen	县
fayü en	法院	sanja	参加
tuenje	团结	jin	斤
gunli	公里	chǐ	尺

zhang	丈	kui	块
mi	米	xuafi	化肥

近期汉语借词在撒拉语中的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术语特别多。从词类上讲,以名词、动词、数词、形容词等居多。

(二)撒拉语吸收汉语借词的主要方法

1、音译法。即将汉语词汇引进撒拉语时原词的语音基本保持不变,如以上绝大部分借词都是这种类型的词。

2、半意译半音译或半音译半意译法。这种词汇是撒拉语固有词与汉语借词的组合,或者是汉语借词和撒拉语固有词的组合。例如:

qara šatang	qara + 沙糖	黑糖
qizil lazi	qizil + 辣子	红辣椒
el šügun	el + 毛巾	手帕
ot zenzǐ	ot + 剪刀	火钳
dimur banding	dimur + 凳子	铁凳子
xey ba ġ	鞋 + ba ġ	鞋带
lazi yaš	辣子 + yaš	辣椒菜
sîn qox	信 + qox	信封
ganmo em	感冒 + em	感冒药
gangbi tox	钢笔 + tox	钢笔套
xui aš	会 + aš	开会
dambasǐ dangnǐ	dambasǐ + 当	当领导

3、音译加注法。即在吸收了汉语词汇后,为便于理解在该词后又加上解释性的撒拉语词,如:

mazhi xa ġit	mazhi(麻纸) + xa ġit(纸)
mudǐn jijix	mudǐn(牡丹) + jijix(花)
changbali armut	changbali(长把梨) + armut(梨)
lüguo qazan	lüguo(铝锅) + qazan(锅)
yüshi daš	yüshi(玉石) + daš(石头)

4、音译词加撒拉语构词成分法。即在汉语借词后加撒拉语词缀来组成新的词,例如:

sefinji	sefin(裁缝) + ji	裁缝
funieji	funie(副业) + ji	搞副业的人
dangna ġuji	dangna(当) + ġuji	当……的人
janggili	janggi(庄稼) + li	农业
cügulix	cügu(竹篾) + lix	篾笼
bangniš	bang(帮) + niš	帮忙
sola	so(锁) + la	锁
bola	bo(包) + la	包
damna	dam(担) + na	担
zele	ze(接) + le	接
cönle	cön(劝) + le	劝

5、音译加撒拉语动词et的方法。这是把汉语

动词吸收为撒拉语动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如:

shangkī(上课) et	上课
jexun(结婚) et	结婚
fazhan(发展) et	发展
zhaogu(照顾) et	照顾
dasuen(打算) et	清算(词义有了转义)
duenlien(锻炼) et	锻炼

6、改变动词语序法。即在吸收动宾结构的汉语动词时,往往按撒拉语的语法改变汉语词汇的语序,再加上撒拉语词缀 -la、-na 等,如:

kī(课) shang(上) - na	上课
xun(婚) je(结) - le	结婚
vang(网) shang(上) - na	上网
dang(当) shang(上) - na	上当

三、汉语对撒拉语语音的影响

随着汉语借词的大量进入,撒拉语的语音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撒拉语在语音方面成了整个突厥语中受汉语影响最大的语言之一。汉语在语音方面对撒拉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 辅音 zh[ʈʂ]、ch[ʈʂʰ]、sh[ʃ]、r[ʐ] 的出现
zh、ch、sh、r[ʐ] 在撒拉语中的存在是汉语对撒拉语语音方面影响的最大结果。这组舌尖后音是随着汉语借词数量的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它们已成为撒拉语语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如:

zhuši	主席	zhīnfu	政府
fazhan	发展	zhala	炸
chizi	车子	cheyiu	柴油
cichī	汽车	chala	查
shazi	沙子	shībin	柿饼
shizi	狮子	shī	是
ribīn	日本	rili	日历
ruzi	褥子	rīnkou	人口

我们在书写撒拉语时,r 原为撒拉语的颤音,但由于它不出现在词首,而汉语借词中的 r[ʐ] 只出现在词首,所以我们在书写过程中只用一个符号 r 来代替这两个音。

以上这组舌尖后音在撒拉语中主要是用来拼写汉语借词的,但其中的 sh 有时也可拼写为非汉语借词,如:

qosh	双	ashlīx	粮食
dushīn	兔子	mush	花椒

这些词中的 sh 原为 ʃ 音,现在有时人们也发作 ʂ 音,但据笔者观察,sh 音的使用更广泛一些。那么 sh 音在撒拉语固有词中的出现,是不是也受了汉语舌尖后音的影响呢? 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二) 送气和不送气对立辅音的出现

撒拉语和其他绝大多数突厥语的一个区别是存在着送气和不送气辅音的对立。其他突厥语中(西部裕固语等极少数突厥语除外),塞音和塞擦音有清音(一般都是送气音)和浊音之分,而撒拉语的清音和塞擦音都是清音,没有浊音。另外,撒拉语的清塞音存在着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

b [p] — p [pʰ]	d [t] — t [tʰ]
g [k] — k [kʰ]	q [q] — q [qʰ]
j [ɟ] — ċ [ɟʰ]	zh [ʈʂ] — ch [ʈʂʰ]

举例:

balī	孩子	pallī	泡
bo	伯父	po	炮
dam	墙	tam	淡
dox	盖子	tox	盘子
galī	高兴	kalī	篮子
gon	皮子	kon	宽
q [q] ur	干	q [qʰ] uš	鹰
q [q] ır	刮,铲	q [qʰ] ıš	冬天
jillī	刺	čillī	叫
jallī	绣(花)	čallī	咬
zhali	炸	chali	查
zhizi	折子	chezi	车子

很明显,由于大量借用汉语词汇,汉语中的送气与不送气辅音对立现象也进入了撒拉语当中。但撒拉语固有词中存在的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是否也是受汉语影响而形成的呢? 对此,前苏联学者埃·捷尼舍夫明确地说:“送气音是随同汉语借词一起进入撒拉语的。后来它们渗到撒拉语原有的单词里,从而成为语音的组成部分。”^[11]

正如捷尼舍夫所说,撒拉语中存在的系统的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对立是可能受到汉语影响而形成的,因为,受汉语影响同样很深的西部裕固语中也存在着送气与不送气辅音的对立。^[12]从地理上而言,这两种语言远离其他突厥语族语言,和汉语关系最为密切。但 Dwyer Arienne(杜安霓)指出,撒拉语中许多以送气清塞音 p 开头的词在其他乌古斯语词中和浊塞音 b 开头的词相对应,而撒拉语和维吾尔语却非常一致。因此,她认为,撒拉语中的这个送气音有可能是在维吾尔语的地域影响下而形成的。^[13]

其实,在其他突厥语中没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对立,并不说明在这些语言中根本不存在送气音。在这些语言中塞音和塞擦音只有清音和浊音的对立,而没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但这些语言的清音一般都送气。^[14]成书于 11 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也记载当时突厥语中的 p、t、ċ、k、q 为送气清塞

音,与它们相对的是不送气的浊塞音 b、d、j、g,上面的 q 音没有对应的浊音。^[15] 由于这两组音的主要区别是清浊之分,送气和不送气并没有成为它们的音位区别特征。但送气音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撒拉语固有词的送气音可能本来就已存在,并不是像捷尼舍夫所说的“随同汉语借词一起进入撒拉语的”。与这些送气音相对应的浊音可能变成了清音(这可能是受到了汉语的影响),而使得撒拉语中塞音和塞擦音失去了清浊对立,最终形成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音位区别特征。如果前面这些辅音的清浊对立不消失,送气和不送气也不可能形成它们的区别特征。因此,撒拉语中塞音和塞擦音的清浊之分可能是在汉语的影响下消失的,因为,汉语中塞音和塞擦音没有清浊之分,都是清音。^[16] 这才最终导致了撒拉语中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对立。

(三)复合元音的增加

汉语借词的吸收,使得汉语中的复合元音也随之进入了撒拉语的元音系统当中,如:

funie	副业	guoja	国家
liong' a	袜子	yangyiu	洋芋
bio	表	kueji	会计
diot	四	müsiux	猫
töniangqür gĩ	周围	šües o	学校

有些复合元音出现在撒拉语固有词里,但大多数还是出现在汉语借词当中。复合元音的增多,使得撒拉语的音节结构发生了变化。撒拉语的音节一般都包括元音。根据音节的多少,可以把撒拉语的音节结构分为以下几种类型(Y 和 F 分别代表元音和辅音):

Y	a	他(地、它)的	o	男孩
YF	un	面粉	em	药
FY	gi	穿	yi	夏天
FYF	kem	谁	dal	树
FYY	bio	表	diu - so - ğun	大前天
FYYF	diot	四	liang - zĩn	舒服

在以上音节类型中,前四种较为常见,它们是撒拉语固有的音节形式,而后两种在撒拉语中的出现频率较低,它们主要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

在谈到汉语对撒拉语语音的影响时,捷尼舍夫还谈到一个问题。他说撒拉语词干末尾有时附加 -r,附加这个音后,这些词的词义仍然不变,如:

kiyn kiynur	未婚妻, 妻子
yangzi yangzur	样子
a ^h t a ^h tur	马

捷尼舍夫认为这种词尾加 -r 的现象(词的“儿

化”)只能是在汉语的影响下产生的。^[17] 但根据撒拉语的实际情况,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撒拉语当中词尾(一般都是在名词词尾)加 -r (实际上为 -or)后,词的语法意义是发生变化的。加 -r 后表示该名词的不定指,当话语材料中第一次出现某个不定指(不知道或没必要知道的)事物或人时,往往把 -r 加名词后边,然后当话语材料再出现该名词时,就在该名词的后边附加 -cix,表示那个事物或人。如:

oholdĩ bosor vumiš, bos cixge an(ĩ) or vumiš.

从前,有个老伯,那个老伯有个女儿。

在这里 bos、anĩ 都是第一次出现,因此它们都必须后加 -or,否则这个句子是不成立的。这种现象跟英语中的冠词 a (an) 非常相像,如:

Once there was an old man, and the old man had a daughter.

从前,有个老伯,那个老伯有个女儿。

这里的 a 和 an 的作用与撒拉语的 -or 完全相同,都指事物或人的不定指。撒拉语的 -or 和汉语词的“儿化”是不一样的,汉语词尾加了“儿”后并没有不定指的含义。因此,说撒拉语的名词后的 -or 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观点并不正确。

四、汉语对撒拉语语法的影响

在语言三要素中,语法的稳定性最强,因而一种语言的语法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是较为缓慢的。相对于词汇和语音而言,撒拉语的语法受汉语的影响是较小的,但这并不说明撒拉语的语法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和其他突厥语相比,撒拉语的语法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与汉语的接触是撒拉语语法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汉语对撒拉语语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shĩ”(是)字句的产生

撒拉语中有一种由系动词(i) dĩr、ira 和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组成的陈述句,如:

diu andĩ tixil ğuji o cix Salĩr (i) dĩr.

在那儿站立的那个男孩是撒拉族。

ani ğ i abasĩ u mišddi ği axun dĩr.

他(她)的爸爸是那个清真寺的阿訇。

bu sang' ĩ ve ğanĩ armut ira.

这是给你的梨。

Ali ani ği gagasĩ ira.

阿里是他(她)的哥哥。

由于长期以来和汉语的接触,汉语中用“是”的判断句对撒拉语的上述句子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撒拉族中、尤其是年轻人,汉语的“是”字句正逐

渐和撒拉语原有的句子结构融合在一起,如:

diu andī tixil ġuġi oċix shī Salīr (i) dīr.

在那儿站立的那个男孩是撒拉族。

ani ġi abasī shī u mišddi ġi axun dīr.

他(她)的爸爸是那个清真寺的阿訇。

bu shī sang' ī ve ġanī armut ira.

这是给你的梨。

Ali shī ani ġi gagasī ira.

阿里是他(她)的哥哥。

前后两组句子相比,后一组句子中都多了一个来自于汉语的“shī”(是)。这个判断动词和撒拉语原有的系动词(i) dīr、ira 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而撒拉语的意思并没有因这个汉语判断动词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二)撒拉语数量词的汉化

关于撒拉语的数词,除了 zanzī(万)来自于汉语外,其他的基数词都是撒拉语所固有的。但是,在实际的语言交流中,撒拉语原有的数词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50 以上的十位数名称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了。撒拉族中老年人一般用 50 加上相应的十位数名称表示 60、70、80、90,如:

on	十	elli on	六十
yi ġirmī	二十	elli yi ġirmī	七十
otus	三十	elli otus	八十
qirīx	四十	elli qirīx	九十
elli	五十	išgi elli (bīr yūz)	一百

至于年轻人和小孩,绝大部分都用汉语数词来表示这些数字,甚至于 50 之前的数字他们也经常用汉语来表示。

在序数词当中,除了在表达月份和浇水次数时

人称	土耳其语		撒拉语		意义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ge —m. ġin	ge —m. ġinz	gi—m. ġ	gi—m. ġ	(看来)我/我们来了。
第二人称	ge —m. ġin	ge —m. ġiniz	gi—m. ġ	gi—m. ġ	(看来)你/你们来了。
第三人称	ge —m. ġ	ge —m. ġer	gi—m. ġ	gi—m. ġ	(看来)他/他们来了。

由于撒拉语动词没有人称变化,因此,表示以上各种意义时,在撒拉语中还需在句中加相应的人称代词。

五、结论

由于来自于汉语持续而强烈的影响,撒拉语在词汇、语音和语法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在语法方面撒拉语固有的粘着语特征逐步减少,而类似汉语的分析型特征不断增加;同时,撒拉语的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显示出濒危语言的特点。^[21] 因此,加

还有部分人使用撒拉语外,在其他方面都已不使用撒拉语了,而全部转用汉语了。其他的数词,如分数词等也都基本上使用汉语了。对此,捷尼舍夫早就指出:“可以说,撒拉语的数词现在只是一种残存的范畴。在这里,汉语的词几乎把整个这一类词都代替了。”^[18]

由于撒拉语本身的量词不是很丰富,因而在和汉语的接触过程中,撒拉语也吸收了许多汉语量词,如:

xa ġīt bīr zhang	一张纸
boz san chī	三尺布
un īrshī jin 或 (un yi ġirmī omīn)	二十斤面
azīt sī mu	四亩地
heli yibe kui	一百元钱

(三)原有语法范畴的消失

由于受到不同语言类型——汉语的强烈影响,撒拉语的粘着语特征已经部分地消失了,撒拉语逐渐体现出类似汉语的分析语特点。和其他突厥语相比,撒拉语名词领属人称附加成分已没有数的区别,只剩下人称区别了,如:^[19]

	土耳其语	撒拉语	词义
第一人称	kolum	qolīm	我的胳膊
	kolumuz	qolīm	我们的胳膊
第二人称	kolun	qolīng	你的胳膊
	kolunuz	qolīng	你们的胳膊
第三人称	kolu	qolī	他(她)的胳膊
	kolu	qolī	他(她)们的胳膊

和土耳其语相比,撒拉语的动词也失去了人称和数的区别,如:^[20]

强语言接触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保护撒拉语方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 ①关于匈奴是否有文字的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存在分歧。参见马伟. 论撒拉族的六角形符号 [J]. 中国撒拉族, 2008 (2).
- ②此文撒拉语例子为笔者田野调查资料,拼写方法以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使用的撒拉语拼写符号

为准, 详见《中国撒拉族》2008年第 1期, 或见中国撒拉族网“撒拉语拼音方案”, http://www.cnsalar.com/News_View.asp?NewsID=47 [2009-3-4].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 语言学基础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280.
- [2] 罗美珍. 论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 [J]. 语言研究, 2000 (3).
- [3] 马伟. 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 [J]. 青海民族研究, 2008 (1).
- [4] 杨建新.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277.
- [5] 卞一之. 撒拉族史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87.
- [6] 龚景瀚. 循化志. 卷四 [M].
- [7] 陈琮. 陈氏家谱 [M]. 1995年油印本.
- [8] 张成材, 朱世奎. 西宁方言志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
- [9] 郭纬国. 循化方言志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0] 马伟. 循化汉语的“是”与撒拉语 [S]. 青海民族研究, 1994 (3).

[11] [17] [18] [苏] 埃·捷尼舍夫. 突厥语言研究导论 [M]. 陈鹏,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553-556-563.

[12]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 突厥语言学导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310.

[13] Arjanne Dwyer. Salar: A Study in Inner Asian Area Contact Processes. Part I. Phonology [M].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7: 213.

[14] 韩建业. 撒拉族语言文化论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9.

[15] 赵明鸣. 《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156-165.

[16]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38.

[19] [20] [苏] 埃·捷尼舍夫. 土耳其语语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29-84.

[21] 马伟. 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及原因分析 [J]. 青海民族研究, 2009 (1).

(责任编辑 马 燕)

Contact Induced Changes of the Salar Language

MA Wei

Abstract: Based upon research on the contact between Salar and Chine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end of Salar language changing toward Chinese in the aspects of vocabulary, phonology and grammar,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long and intense influence from Chinese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endangerment of the Salar language.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Chinese; the Salars; change